

漢語詞彙複音化新探

沈懷興

河南師範大學中文系

漢語詞彙複音化發展雖然早從上古就已經開始了，但被學者所發現，卻是最近七十多年的事。在這七十多年裏，不少學者立足漢語符號系統，先後對詞彙複音化成因問題做過一些探索。本文試改從人的認知角度、從言語造詞角度，以歷時社會語言學的觀點、方法考察漢語詞彙複音化成因問題，故謂「新探」。

一、七十多年來漢語詞彙複音化成因問題的研究

大家知道，最早發現漢語詞彙之複音化發展傾向的是瑞典學者高本漢。他1923年出版的*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一書，被張世祿譯作《中國語與中國文》（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書中說，古代漢語發展到近代漢語，因為語音系統簡化，而使同音詞大量增加，為了避免同音混淆，不得不變更語詞組織。此可謂「語音簡化」說。

國內最早闡發高氏觀點的是張世祿。他在1930年發表的《中國語的演化和文言白話的分叉點·語言原料實際的改造》中詳細闡述了高氏之說，又在1939年發表的《因文法問題談到上言白話的分界》一文中作了必要的修正，指出：「在實際語言當中，並非僅因音讀系統的簡單化，為了避免同音的語詞，才把單詞改成複詞的。」

二十年以後，王力（1958；342）既接受高氏「語音簡化」說，認為：「單音詞的情況如果不改變，同音詞大量增加，勢必大大妨礙語言作為交際工具的作用。漢語的詞逐步複音化，成為語音簡化的平衡錘。」同時還補充外語的吸收作為漢語詞彙複音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又受張氏之說影響，（1958；343）進一步指出：「即使語音不簡化，也不吸收外來語，漢語也會逐漸走上複音化的道路的，因為這是漢語發展的內部規律之一。不過，由於有了這兩個重要因素，漢語複音化的發展速度更快了。」高氏「語音簡化」說到了王力那裏已經發揮得淋漓盡致，所以影響很大。此後二十多年無異議。

「語音簡化」說一統語言學界六十年。到了1982年，程湘清發表了相反的意見，認為不是語音系統簡化導致了詞語複音化，而是詞語的複音化導致了語言系統的簡化。至於漢語詞彙複音化發展，他認為「是語言內部矛盾——交際任務同交際手段之間的矛盾推動的結果」。他說，漢語詞彙複音化發展，「（1）從『消極』方面說，是為了更準確、周密

地表達思想，進行交際」，「漢語詞語的雙音化不但避免了音系繁雜、同音詞過多等弊病，而且能夠更準確、周密地反映客觀，交流思想」；「(2)從『積極』方面說，是為了更形象、生動地反映客觀，進行交際」。此可謂「語言內部矛盾」說。

潘允中(1989；37-40)也認為漢語詞彙複音化的根本原因在語言內部矛盾運動，但與程說不盡相同。他認為，「在上古典籍中，詞彙向複音化發展的趨勢已極為顯著」，其原因之一是「同音的單音詞太多」，在一點與程氏(1)一致；其原因之二是「同義的單音詞過於紛繁」，這一點是潘先生的發明，但實難成立，所以其後無人響應。

較早從詞義角度解釋漢語詞彙複音化成因的有楊欣安。他在《西南師院學報》1985年增刊上發表文章說：「現代漢語雙音詞佔優勢，是漢語的詞義逐漸準確、語法也更加嚴密的結果。」只是討論不夠充分。此後幾年從詞義角度探討漢語詞彙複音化成因問題的學者不少，但直到蘇新春(1995；185-195)才有較全面的交代。他說：「概括起來說，單音詞在日益發展的詞彙面前表現出三個弱點。這就是具體詞義滿足不了人們的認識日益概括、抽象的需要；寬泛的詞義滿足不了語言交際日益精密、準確的需要；有限的詞形結構滿足不了與時俱增的詞彙增長的需要。單音詞的三個弱點成為漢語詞彙走向複合詞化的內在動因。」這裏，蘇氏雖然在論漢語詞彙複合詞化的內在動因，但由於漢語複合詞是複音詞主要部分，所以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在談漢語詞彙複音化發展的動因，並且所談重心亦在詞義準確性問題，故暫將這派學者意見謂之「詞義準確」說。

近十年來，探討漢語詞彙複音化成因的學者，多把「語音簡化」說、「語言內部矛盾」說和「詞義準確」說結合起來討論問題。如黃志強、楊劍橋(1990)的文章就曾對過去近七十年研究作了進一步闡發和補充。文章說：「語音的簡化只是詞彙複音化的最重要的外部原因」，「漢語詞彙複音化的重要的內在原因是詞彙系統本身的急劇發展，首先是詞彙量的迅猛增長。」「其次，詞彙系統本身的急劇發展，還表現在詞義的發展變化上。」「漢語詞彙複音化的第三個原因是語言交際功能要求不斷提高詞彙表義的精確性、明晰性，盡量避免負荷過大的多義單音詞可能產生的歧義。」「除了上面三項基本原因外，漢語詞彙複音化也與上古漢語中特別是詩歌韻文中多用疊音詞、聯綿詞有關。」「另有兩個造成漢語詞彙複音化的因素：其一，上古具有複輔音聲母的單音詞通過增加元音的方式而成為具有單輔音聲母的雙音節詞。(例略)其二，外來詞的音譯。」

繼黃志強等文章之後，不時有探討漢語詞彙複音化成因問題的文章繼續發表出來，但大多只是對黃志強等文章某一點的深入，所以真正能夠雙過去七十餘年研究之大成的文章只有許威漢(1998)一篇。許氏從漢語孤立語特點出發，認為「複音詞的產生主要是應詞彙內部調節需要」，於是補充、深化已有研究，加以綜合利用，使各家之說在其總論點的統攝下各得其所，和睦相處。具體點說，許氏文分四部分：(一)突破語音(音節內部)構詞的局限。認為：「語音系統複雜化激發詞彙複音化，詞彙複音化引致語音簡化，語音簡化再反過來促進詞彙複音化。」這就把高本漢、張世祿和王力等學者主張的

「語音簡化」說同程湘清力主的「語言內部矛盾」說之(1)(其(2)尤為片面，後面還要說到)統一起來了。(二)制約單音詞語義模糊性。認為：「單音詞具有多義性和靈活性，信息負荷量一般都比較大，相應地模糊性也比較大」，「複音詞大量產生相應地制約了單音詞語義的模糊性，大有利於語言交際職能的發揮」。這就使原有的由「語言內部矛盾」說發展而來的「詞義準確」說顯得嚴密一些了。(三)使詞義互補、語法功能專一。這是「詞義準確」說的延伸，此前同類文章中有的已經提到，只是不及許氏文章明確簡要罷了。(四)使語詞明確、精煉、生動。這裏的「明確」，是指變單音詞為複音詞可避免同音混淆。至於「精煉、生動」說，分明是受程湘清「語言內部矛盾」說之(2)和文化語言學有關理論影響，結合修辭美學和傳統音韻學提出的，看似理由充分，實則缺乏口語基礎，不具普遍性。總之，許氏不僅發展了「語音簡化」說、「語言內部矛盾」說、「詞義準確」說，而且將諸說放在較高的理論層次上進行綜合利用，把立足語言符號系統探討詞彙複音化之成因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二、立足語言符號系統探討詞彙複音化成因的局限

回動過去七十餘年對詞彙複音化成因的研究，儘管看上去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所以如此，也許是由於認識上的局限。何以見得？試簡言如下。

首先，立足語言符號系統探討詞彙複音化的成因，就認識論而言是不徹底的，就方法論而言是欠科學的。試問：語言存在於哪裏？存在於言語。語詞何來？來自社會實踐。沒有社會，沒有社會發展，沒有人們的實踐活動，沒有人們的認識與反映，是不會有語詞的。因此，探討詞彙複音化成因，就是要結合社會發展和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對相應事物的認知過程及其反映考察複音詞的生成情況，借以求得發生學意義上的有力證據。這樣說來，此前那種立足語言符號系統探討詞彙複音化成因的研究，就有點兒像南京某人本不知長江源頭，但由於發現江中漂來武漢之某物，而誤認為長江發源於武漢了。

換言之，語言不是自給自足的，而是依賴社會和人類而存在與發展的，這便決定它不能同時也不會是獨行其是的管家婆，而只能是對社會與人類百依百順的賢婦人。考察管家婆的行為變化是要著眼於其自身，而考察一位百依百順賢婦人的行為變化則不可忽視其主人。然而此前立足語言符號系統考察詞彙複音化的成因，就是誤把一個百依百順的賢婦人當作獨行其是的管家婆來看了。所以其結論不甚可靠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研究者提出的「語音簡化」說、「語言內部矛盾」說、「詞義準確」說等，多帶片面性，有的甚至純屬想當然。例如：「語音簡化」說者認為，語音系統簡化了，為了避免同音混淆，就把單音詞改為複音詞。其實，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誤解。第一，治漢語史的人也許不會否認：漢語詞彙複音化發展早從上古就開始了，而漢語語音系統的簡化

卻不是從上古開始的。第二，語詞用於交際，總是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進行的，受語境的制約，同音未必相混。第三，有些常用詞，如「五」和「午」、「忠」和「盅」等等，他們讀音兩兩相同，《現代漢語詞典》所釋義項數目亦兩兩相同，而由他們構成的複音詞數目卻兩兩懸殊，這是怎麼回事呢？對此，即使連「語言內部矛盾」說和「詞義準確」說都考慮在內，仍不能解釋其懸殊，這又該怎樣解釋呢？

又如「詞義準確」說，由於它也主要局限於語言符號系統說話，所以它的論述也是浮泛的，其結論也是不很可靠的。這個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語言觀問題，比較複雜，限於篇幅，本文暫不集中展開討論。這裏只舉幾個「詞義準確」說不能解釋的例子。如「是」和「視」同音，《現代漢語詞典》為「是」列了三個字頭，共釋16個義項，但由它參與而構成的雙音節合成詞只收了30條；「視」只有3個義項，但由它參與而構成的雙音節合成詞卻收了66條；義項不及「是」的五分之一，構詞卻超過「是」的二倍！《漢語大詞典》中「是」的義項比「視」多四個。而據《多功能漢語大詞典索引》統計，其收由「是」構成的雙音詞只有116條，收由「視」構成的雙音詞則多達292條，超過「是」的二點五倍。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又哪裏是立足語言符號系統的「詞義準確」說解釋得清楚的？又如，據調查，河南平頂山方言中有個「萬能動詞」[tuei³⁵]，有音無字，至少要有八十多種含義，在當地口語中幾乎一般人的所有動作都可以用[tuei³⁵]來表達，越是隨便的場合其出現頻率越高，但由於有具體語境的幫助，調查中沒有聽說誰甚麼時候因[tuei³⁵]的多義而發生誤解。古漢語中也有個萬能動詞「為」，現代漢語其他不少方言地區也有這樣的單音節萬能動詞，人們在言語交際中一般不會因它們的多義多用而發生誤解。尤其像「又」字之類，古今都是多用多義詞，但古今都沒有能產性，有誰為了詞義準確造些複音詞來分化它們的某種含義了？另外，現代北京人口頭上的量詞「個」也用得很「濫」，牛、鷄、船、橋等都說「個」，也不曾使人誤解。這類現象很值得研究。

至於「語言內部矛盾」說，它肯定詞語複音化避免了音系複雜、同音詞過多等弊病，只是與「語音簡化」說的認識過程不同罷了。因此，「語音簡化」說的片面性，它也未能避免。它認為詞彙發展、詞語複音化可以準確反映客觀、交流思想，卻沒有充分聯繫社會及其發展與人的認知規律，而主要是立足語言符號系統討論問題，這與由它發展而來的「詞義準確」說是一致的，所以「詞義準確」說的問題它也是有的。尤其是說分論點(2)所謂「從『積極』方面說，是為了更形象、生動地反映客觀，進行交際」最難成立。論者說：「漢族人民自古以來形成這樣一種審美觀點，就是講究對稱」，「這一心理素質和審美觀點反映到語言上，就是講究成雙成對的語言片斷和節奏，單音節要變成雙音節」。又說：「說話行文，講究對偶，說起來上口，聽起來悅耳，看起來整齊，確實增強了語言的表達力」，「由於對偶的要求，就會導致一種可能：本來用單音詞的地方，因連鎖反應而改用雙音詞語。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雙音節詞的產生和應用」。我們認為，如果說漢

語中少數書面語詞的產生有這方面的因素，也許沒有多少人反對；但如果把它看作漢語詞彙雙音化兩大成因之一，就讓人不敢苟同了。試問：研究語言的發展，是否應當立足自然語言？然則考察古今文獻資料，可知越是接近自然語言者便越是與論者之言相反，即越自由、越不講究對偶，這又該作何解釋？大家知道，駢偶於文，六朝最盛。而劉勰於《麗辭》中卻說：「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圖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見《文心雕龍》卷七）看來，今論者之見，即使放到六朝，也未必真能服人呢。再者，若像論者所言，因講究對偶而使單音詞變成雙音詞，則有悖語言經濟原則，那麼，由此而來的雙音詞又怎麼能被語言社會所接受呢？語言社會不予接受，漢語詞彙怎能因此而走向複音化道路？至於漢族人民「心理素質」、「審美觀點」云云，這些至今尚未弄清楚的東西，竟於20年前就拿來證明某種學術觀點，就更顯得有點輕率了。

再其次，研究者對語言材料的取捨大多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漢語複音詞古今都以複合詞為主，這一點沒有疑問。可是，複合詞中以哪種結構方式構成的為最多？意見就不夠統一了。而這個問題得不到正確的解答，將會影響詞彙複音化成因的探討。以前，學者多以為聯合式複合詞為最多，但這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向熹（1989）考察《詩經》，發現共有複合例706個，其中偏正式複合詞484個（約佔68.56%）；又聯繫現代漢語裏複合詞的情況，斷言漢語複合詞發展史上始終以偏正式複合詞為最多。筆者（1998）系統考察的結果是，從上古到近代，漢語複合詞中偏正式結構者佔58.56%以上，現代漢語中佔47.78%。然而，近二十年以來，研究漢語詞彙複音化的學者大多以聯合式複合詞為考察重點和立論依據，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偏正式複合詞的考察，然則即使認識論上沒有問題，即使可以立足語言符號系統研究詞彙複音化成因，而具體研究中對材料取捨如此偏頗，其結論的可靠性也難免要大打折扣了。

總之，過去七十餘年間，學者們立足語言符號系統研究詞彙複音化成因，就某種意義上說，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同時也存在著嚴重問題，要想真正弄清漢語詞彙複音化成因，還需要繼續努力。下面試陳鄙見，以作引玉之磚。

三、社會發展促進複合詞產生，推動詞彙複音化形成和發展

語言依附於社會：社會產生，語言產生；社會發展，語言發展。並且，受社會影響最快最明顯的是詞彙。據此，我們推測，至遲到父系氏族社會早期，漢語裏就應該有一定數量的複合詞了。按照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父權制一旦形成，表明社會已經相當發展。此時農業已經相當發達（這就可能出現反映各類谷物之特點的複合詞），專偶婚制基本形成（大汶口文化中有男女合葬的墓葬。這就可能出現男女、夫婦、合葬等複合

詞)，國家初步形成¹（這就可能出現司農、司徒、司寇等專有名詞），文字已經產生，甚至已經發展出高級文字體系，即已經出現形聲字的文字體系²（複合詞的產生，不會落在會意字出現之後，更不用說形聲字出現時代）。這樣的社會，人的思維已較縝密，認識已較全面、深刻，照理說，給事物命名中一定會時常出現「單不足以喻」的情況，於是語言中複合詞便應運而生了，儘管目前考古學研究還不能證明這一點。

稍後，即到了有夏時代，口語中複合詞該較常見了。史載，夏后帝啟之長子名太康，次子名中（仲）康，曾孫名少康。從此祖孫三代的三個名字看，當時偏正式構詞法已經相當能產了，口語中偏正式複合詞當不會太少了。

稍後，社會發展加快，一些日常活動需要記清楚日子，於是殷高祖亥發明干支記日法（一說用干支記日在此前已經出現），於是語言裏一下子產出「甲子」、「乙丑」等60個聯合式複合詞，並且一直沿用了下來。

現有資料中，能夠使我們大致窺見早期漢語複合詞之一斑的是殷虛卜辭，其中大吉、亡尤、今日、翌日、正月等複合詞很不少，而且使用頻繁。它們的大量出現和頻頻使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社會發展的需要。

越往後，社會越發展，複合詞也越多。本文不能盡舉，姑且拿許偉建《上古漢語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來做個說明。該詞典共收上古漢語常用詞1634條，其中複音詞741條，約佔45%。由此可知早從上古漢語中，詞彙複音化的程度就比較高了。在這741條複音詞中，除去疊音詞和重疊詞共21條，以及結構不明的與單純詞共32條之外，下剩688條。其中偏正式複合詞411條，約佔60%；聯合式複合詞191條，約佔28%。剩下不多的複合詞是其他結構方式的。這與筆者（1998）考察其他材料所得的結果基本一致。出現這樣的結果，我們完全可以從社會發展角度與漢人認知規律找到原因，也只能從社會發展角度與漢人認知規律尋找原因，而不能從漢語符號系統上找原因，這就像不能從瓶裝的酒中考察酒是怎麼釀成的一樣。

如果說本節上面所涉及到的材料部分人不感興趣，現在來看一個與人們社會生活較為貼近的例子。隨著父權制社會的發展，宗法制產生了。宗法制至西周初發展完備。由於貴族階層的全面推行，一般社會成員也深受影響，所以漢語社會的親屬稱謂很有特色。如父親以上三代依次稱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兒子以下七代稱孫、曾孫、玄孫、來孫、昆孫、仍孫、雲孫。這些稱謂反映到語言中多是複合詞，並且多是偏正式複合詞。這是男性的「主」的一方。至於「從」的一方，以及女性的一方則更多（詳見《爾雅·釋親》），反映到語言中自然也多是偏正式複合詞，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1 在華夏大地上，國家的形成很可能更早一些。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報》報道：考古發現遼寧西部山區早在五千多年前就已存在著一個具有國家雛形的原始文明社會，而當時那裏還是母系氏族社會。

2 詳見拙作《漢字起源四題》，《漢字文化》1998年第2期。

如果再作點跨文化比較，問題就更清楚了。如漢語社會有叔父、伯父、舅父、姑父、姨父之分，英語、日語等社會中沒有這種分別。這就更需要到社會文化歷史中去找原因。如果只是從語言符號系統中找原因，那就無異於緣木求魚了。

社會發展之最突出最明顯的標誌是新事物的不斷出現。任何新事物出現的同時總需要有一個新名字來指稱它。然而，大多數新事物都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們總是要和某些原有的事物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繫，這種聯繫一旦被人們認識並希望表達出來的時候，語言中就很可能相應地出現複合詞，並且多數情況下是偏正式複合詞。例如，原來搞單一經濟時，提到「農民」，人們馬上就知道是指種莊稼的人。現在經濟搞活了，農民分工了，於是漢語中就產生出「糧農」、「棉農」、「菜農」、「果農」、「瓜農」、「蠶農」、「茶農」、「菸農」、「蔗農」、「藥農」、「花農」、「林農」等偏正式複合詞。

社會發展過程中有時也會出現一些人民大眾不希望有的東西，反映到漢語中同樣會出現一批批的合成詞。例如，《新鄉日報》1996年4月12日刊登《想當年物資供應緊，憶往昔票證知多少》一文，就吃、穿、用三個方面列舉了曾經使用過的種種票證，其中僅吃的方面就先有糧票、油票等，繼而又有鹽票、肉票、糖票、黃豆票、紅薯票、白菜票、蘿蔔票等共40種之多，反映到漢語中便產生了40個偏正式複合詞。

總之，由社會發展而產生大量複合詞，導致詞彙複音化；社會繼續發展，則促進詞彙複音化發展。我們探討詞彙複音化發展問題，絕不可忽視社會發展這一重要因素。

四、人的認識及其發展決定複合詞產生，主導詞彙複音化發展

一般說來，人類認識及其發展與社會發展是分不開的。渾言之，詞彙複音化是此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析言之，社會、宇宙萬物的發展變化是詞彙複音化發展的客觀基礎，是水；人類認識的發展變化是詞彙複音化發展的徑流式水力發電站，漢語詞彙複音化就是水流通過水力發電站發出來的電。因此，社會、宇宙萬物發展越快，也就是水流越大，水力發電站的發電量就越高，也就是詞彙複音化發展越快。這樣說來，應該補充一句，上一節從社會發展角度討論詞彙複音化成因，只是為了敘述方便，並沒有否定人的認識及其發展變化在詞彙複音化發展中的作用。本節下面站在人的認識及其發展角度探討漢語詞彙複音化成因，同樣是在肯定社會發展之作用的前提下展開討論的。

上古漢語裏為甚麼以單音詞為主？先民社會實踐活動範圍不廣，層次不高，這便限制了其抽象思維能力的發展，因而認識能力不強，觀察事物多限於表面化，對事物的發展與聯繫常缺乏明確的認識，所以給事物命名也多是直接的、籠統的、簡單的，這些名字反映到語言裏便是一個一個的單音詞。因此，直到殷墟卜辭之時代，漢語仍以單音詞為主。不過，憑借殷墟卜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人之認識的發展對詞彙複音化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了。例如，卜辭中「吉」十分常見，「大吉」也比較常見。這「大吉」一詞的出現，

就是先民認識發展的結果。因為，「大吉」是造詞者完全掌握了比較法的基礎上造出來的；比較是認識的工具，比較法的掌握，是先民認識發展的重要標誌。其他如「水」和「大水」，「子」和「小子」，「彘」和「白彘」，「馬」和「赤馬」，「鬪」和「東鬪」、「西鬪」，等等，兩兩相較，也可以看出「大水」等偏正式複合詞的產生都是先民認識發展的結果。推而廣之，漢語詞彙發展中，所有為指稱下位概念而改變原來指稱上位概念的單音詞形式創造的複合詞，都首先是人的認識發展的結果。為了較好地說明問題，這裏再舉一個例子。起初人們認識到自然界裏具有生長、發育、繁殖等能力的「物」中實有兩類，飛禽走獸等是一類，花草樹木等是一類，於是分別於「物」之上加「動」或「植」，就造出了「動物」和「植物」兩個合成詞。

隨著抽象概括能力的增強，人們發現「動物」、「植物」都是有生命力的，於是概括這種發展了的認識又造出了「生物」一詞。推而廣之，所有為指稱由概括下位概念而成的上位概念創造出的複合詞，都首先是人的認識發展的結果。

順便說一句，後來人們又發現了病菌、真菌、病毒等微小的生物，遂統稱「微生物」。「微生物」一詞的產生，分明也是人的認識發展的結果。

比較離不開聯想。人們常說，聯想是認識的翅膀。聯想能力與認識能力成正比。隨著人們社會實踐活動範圍的不斷增廣，層次不斷提高，人們的聯想能力也不斷增強，於是漢語中複合詞日漸增多，詞彙複音化程度不斷提高。明顯由此而來的複合詞中，偏正式結構的十分多。為了便於理解，現在只舉現代漢語詞彙中的部分例子：如人熊、板鴨、板油、鷄胸、鱗傷、竊煤、木耳、蝦米、瀑布、石棉、石筍、木馬、水塔、筆直、筆挺、冰冷、雪亮、火熱、瓜分、林立、籠罩、鼠竄、雲集、響應、瓦解、狐疑、吻合、蜂窩煤、火燒雲、牛皮紙、金絲猴、獅子狗、鵝卵石、鴨舌帽、馬蹄表、金字塔、笑面虎、糊塗蟲、蘋果綠、鴨蛋青等等，這類詞一看即明，就不作具體分析了。

人們聯想的豐富在一物多名問題上體現得最為充分，由此而來的偏正式複合詞不可勝計。這裏只舉「月亮」為例。月亮異名很多，僅河南一省就有月公、月婆、月娘、月光、月亮爺、月婆婆、月老娘、月娘娘、月姥姥、明奶奶、明月亮、月亮頭、月亮月、月明奶奶、月母奶奶、月亮菩薩等一大串，不知整個漢語社會有多少。這只是現代漢語口語中的情況。如果再肯做點歷史的考察，包括書面語中的使用情況，就會發現還有月娥、月魄、月桂、月兔、月姊、月華、月球、大明、太陰、玉兔、玉壺、玉蜍、玉魄、玉蟾、白兔、玄兔、玄明、玄燭、西兔、西蟾、地魄、冰兔、陰宗、陰兔、陰魄、陰精、陰蟾、冷月、靈曜、明舒、明蟾、金兔、金魄、金精、寶月、寶蟾、孤蟾、亮月、桂月、桂花、素月、素面、素娥、素魄、素蟾、彩蟾、涼蟾、宵魄、娥輪、娥影、晚魄、銀兔、銀蟾、清暉、皓兔、皓魄、寒蟾、霜兔、霜娥、蟾界、千里燭、太陰星、太陰精、玉蟾蜍等六七個名字。沒有千差萬別的語言環境，沒有人們豐富的聯想，月亮何以有這麼多的名字？語言裏又何以有這麼多的偏正式複合詞？看來，現在一般語言研究

者以為以複代單、古今異名，是為表義明確而分化多義詞義項的結果，其說是很值得懷疑的了。否則，遇到「月」之古今如此多的異名，該作何解釋？

主要由聯想而造出的聯合式詞也不少。如巨、微、道、語、懼、戮等都是書面語詞，後世口語中一般不單說，人們語言使用中聯想到與其相應的口語同義詞，於是分別加個口語詞，造出巨大、微小、道路、話語、懼怕、殺戮等聯合式詞。

除了通過同義聯想造出的聯合式詞以外，還有通過相關義聯想和反義聯想造出的兩種聯合式詞。前者如耳目、骨肉、手足、口舌、喉舌、血汗、心胸、刀槍、分寸、筆墨、江湖、禽獸、人馬、山河、歲月、學問等等，後者如大小、長短、動靜、天地、出入、舉止、老小、收發、表裏、來往、褒貶、得失、起伏、取捨、進退、多少、貴賤、榮辱、輕重、優劣、早晚、先後等等。

動賓式複合詞動、賓之間關係比較複雜，種種關係充分反映出造詞者對客觀存在及其相互之間內在聯繫的認識。沒有客觀存在，沒有人們對客觀存在及其相互之間內在聯繫的認識，漢語裏也不會有動賓式複合詞。這是不言而喻的。這裏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動賓式複合詞在漢語詞彙發展史上遞增速度最快。筆者(1998)考察的結果是，先秦漢語複合詞中動賓式結構者佔4.57%，《辭源》第1冊所收複合詞中動賓式結構者佔16.45%，《現代漢語詞典補編》所收複合詞中動賓式結構者佔19.43%，由此可知動賓式複合詞發展之快！而正是因為這類詞動、賓之間關係複雜，它的快速發展才充分印證了漢人思維認識之發展對漢語詞彙複音化發展的關鍵性作用。

主謂式複合詞和補充式複合詞在古今漢語中都是極少數。具體說來，補充式複合詞在先秦漢語裏還沒有出現，主謂式複合詞也很少。漢魏以後，這兩類複合詞共佔全部複合詞的5%左右。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不能展開討論。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這兩種複合詞儘管所佔比例很小，儘管看上去它們對漢語詞彙複音化進程影響甚微，但它們的發展畢竟是和社會的發展、人們認識的發展相一致。換一句話說，沒有社會的發展，沒有人們認識的發展，這兩類複合詞也不會出現在漢語中。

餘 言

以只上初步探討了漢語複合詞產生和發展情況。至於其他複音詞，如疊音詞、重疊詞、聯綿詞、複音節音譯詞、派生詞等，其產生與發展同複合詞一樣，也都是由社會發展與認識發展決定的。本文初稿曾論及此，但較為粗略，今受篇幅限制，特抽出擬作另文探討。

讀過上文，有學者可能會說，語言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是其內因，過去七十多年立足漢語符號系統研究詞彙複音化發展問題正是著眼其內因，《新探》立足社會發展變化與人的認識及其發展變化探討漢語詞彙複音化發展問題，只是著眼其外因；外因是事物發

展變化的條件，只有通過內因才起作用，看來是《新探》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有問題。竊謂不然。在筆者看來，語言不是一種有機體，只是一種社會現象。它完全依附於人類社會。打個比方來說，人對社會、宇宙萬物及其發展變化的認識如果是一個孩子，語言就是這個孩子的身影；人的認識越發展，語言就越發展，如孩子長得越高身影越大。身影不能決定其自身變化，語言也不能決定其自身發展。具體點說，漢語符號系統內部沒有促進詞彙複音化發展的動力，不是詞彙複音化發展內因之所在。

語言是人的語言，身影是人的身影；離開了人類社會及其發展和人的認識及其發展去研究語言的發展，就是離開了人的成長去研究身影的變化。這樣的研究是與辯證法之內、外因關係說沾不上邊的。所以，一定要套用內、外因關係說的話，只能說，人的認識及其發展是推動語言發展的內部原因，社會及其發展變化和宇宙萬物及其發展變化是語言發展的外部原因。基於這樣的認識，今成《新探》以討論漢語詞彙複音化發展問題。估計此後更深入更嚴密的文章可能會相繼出現，因為漢語詞彙複音化發展問題畢竟是漢語研究中的重大課題之一，三兩篇文章不可能畢其功。但是，如果不改變固有的思路，仍舊立足語言符號系統研究詞彙複音化問題，文章發的再多，也將於事無補。

主要參考文獻

- 王 力 《漢語史稿》，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
- 潘允中 《漢語詞彙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 向 熹 《（詩經）裏的複音詞》，載《詞彙學論文匯編》，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
- 黃志強、楊劍橋 《論漢語詞彙雙音節化的原因》，《復旦學報》（社科版）1990年第1期。
- 程湘清 《先秦雙音詞研究》，載《先秦漢語研究》（校訂本），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按：該書1982年被初版。）
- 蘇新春 《當代中國詞彙學》，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 許威漢 《複音詞的產生主要是應詞彙內部調節需要》，《中國語文通訊》1998年12月第48期。
- 沈復興 《漢語偏正式構詞探微》，《中國語文》1998年第3期。